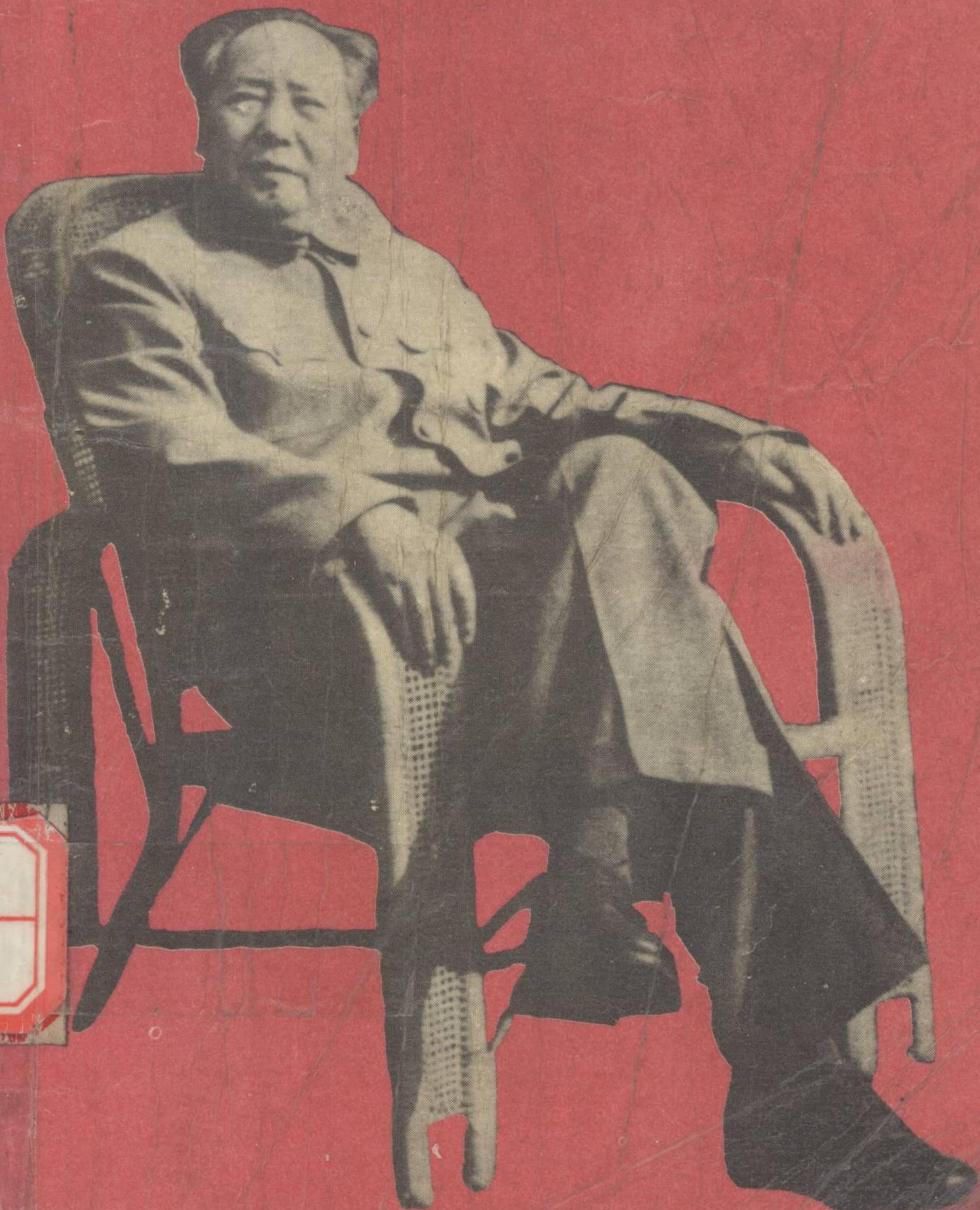


# 毛泽东的后半生

(美)罗斯·特里尔著



7.7  
9

198249

# 毛泽东的后半生

〔美〕罗斯·特里尔 著

曾胡 廖康 陈舜兴 张明 译

李维国 孟光 校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A BIOGRAPHY: MAO  
by ROSS TERRILL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0*

根据美国哈珀·科罗风图书公司1980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江

封面设计：王麟生

毛泽东的后半生

〔美〕罗斯·特里尔 著

曾胡 廖康 陈舜兴 张明 译

李维国 孟光 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5 字数：184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12-0235-4/K·39 定价：3.40元

(内部发行)

## 出版说明

罗斯·特里尔撰写的叙述毛泽东一生活动的《毛泽东传记》一书，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我们节译该书后半部分，将该书第十一章改为第一章，依次递改，遂成此书。

此书记述毛泽东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至1976年去世这27年之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活动，涉及当代中国历史一系列重大事件。书中穿插着对毛泽东周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描写，不少章节还述及毛泽东与众多外国著名政治家的交往。

作者原系澳大利亚人，1979年加入美籍。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政治，是在国际上享誉较高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多次访华，并采访了许多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在撰写此书时，作者参阅的重要文献达40余种。

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评论此书说：“特里尔用了100页的篇幅叙述了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段时期。他的论述虽然比威尔逊（按：另一部毛泽东传记作者）的要简短一些，并且着力于渲染一种气氛或唤起一系列印象，但最后确实提供了一个关于政治变化模式的较好的观念。”还指出：“论述毛最后10年的长长的结尾部分，是特里尔这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一般说来，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作者从头至尾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根据描述了一系列前后相继的阶段……整个说来，作者

所采取的观点是清晰的、前后一致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本书肯定毛泽东创建新中国、提高中华民族世界地位的历史功绩，赞扬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对他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的错误也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作者承认，中国今后仍需要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当然，作者的不少观点、用语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译介此书，仅供研究人员参考；书中个别内容有删节。

1989年2月

# 目 录

<b>第一 章</b>	<b>“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b>	
	(1949—1950) .....	1
<b>第二 章</b>	<b>改造 (1951—1953)</b>	17
<b>第三 章</b>	<b>建设 (1953—1956)</b>	32
<b>第四 章</b>	<b>疑云 (1956—1957)</b>	49
<b>第五 章</b>	<b>修补制度 (1958—1959)</b>	70
<b>第六 章</b>	<b>俄国及远方 (1958—1964)</b>	92
<b>第七 章</b>	<b>引退 (1961—1964)</b>	107
<b>第八 章</b>	<b>乌托邦的狂暴 (1965—1969)</b>	123
<b>第九 章</b>	<b>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969—1971)</b>	158
<b>第十 章</b>	<b>尼克松 (1972)</b>	182
<b>第十一章</b>	<b>破碎的梦幻 (1973—1975)</b>	199
<b>第十二章</b>	<b>强弩之末 (1976)</b>	230
<b>后 记</b>	.....	250

## 第一章

# “我们熟习的东西 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1949—1950)

1949年10月1日，55岁的毛泽东走出他的书房，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升起了国旗。

游行队伍挤满了长安街。毛泽东的汽车前面行驶着一辆坦克。这是一辆“舍尔曼”牌坦克，编号是237438W14。它是从底特律运到上海的，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帮助他消灭毛泽东。“舍尔曼”237438W14刚刚为自由世界服役不久，现在，却隆隆地沿着皇宫前的大道，开进了另一个世界。

毛泽东衣冠楚楚地站在高高的天安门上。南面，一幅孙中山的画像正在不情愿地向他祝福。成千上万的人整齐地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石板地面上，倾听毛泽东总结着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再欺负我们了。

毛泽东做出了一项向英雄表示敬意的决定。尽管百废待兴，政府还是制定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毛泽东为它题写了铭文。铭文是按照通常的战争纪念的式样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向“三年以来”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致敬，接下来是向

“三十年以来”的烈士们致敬。令人吃惊的是还有第三段：向“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sup>①</sup>而牺牲的烈士们致敬。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当作革命的起点。他不仅回忆了与蒋介石战斗的3年和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30年，而且回忆了100年前对外国人的抗击。

共产党的时代不仅囊括自己特有的整个时期，而且被当成了反帝时代的顶点。我想，毛泽东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会这样写这段铭文的。镌刻着毛泽东写的铭文的纪念碑矗立在那里（它是足足有98英亩的天安门广场中的一座花岗岩建筑），表明毛泽东要求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得到合法地位。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回忆起他学生时所崇拜的一位英雄，1911年时，他曾强烈主张让此人当总理，此人就是康有为。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却找到了这条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道：“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sup>②</sup>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成一种手段，用以实现一个象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毛泽东暗示，康有为是理解这一目标的。就象当年康有为活用孔子学说那样，毛泽东正在活用马克思的学说。康有为断言，只要你细读孔子的书，就会从中发现现代世界的生活价值。毛泽东则断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无人能找到到达大同彼岸的方法，因此，大同曾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译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60页。——译注

莫斯科对此一定是很警觉的。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其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也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他宣称，中国文化超过了西方，无需西方再提供任何东西了。“艾奇逊之流”——毛泽东声称——“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sup>①</sup>。~~指封台湾是非共人~~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毛泽东在1949年曾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sup>②</sup>农村的日子已经结束；拿枪杆子的日子也结束了。前面是新的东西：各种预算；各地区之间的争吵；下级军官中间的争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成功后产生的道德问题。

毛泽东的任务暂时是明确的。某些边境地区的肃清战斗仍须进行。台湾、海南岛（靠近越南的一个盛产香蕉的微风和煦的岛屿）和西藏仍未“解放”。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与六七个邻国的边境线仍处于混乱状态。

毛泽东没有触动香港的打算，香港是一个能为祖国孵出许多蛋的金鹅，可让它处于伸手可及的地方。

必须刺激生产。中国已打了12年仗，在此之前，有一半以上的国土兵连祸结，经年不休。工厂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交通运输竟不过是个笑柄。40年代末期，实际上未生产过任何钢铁。

五亿五千万人口必须加入一个有组织的网络之中去。毛泽东把中国的民众比作一张白纸，除非在书写前把这张白纸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405页。——译注

② 同上，第1369、1370页。——译注

牢牢固定，否则就什么也写不上去。

这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政府更迭。一届新的美国政府要面对许许多多的社会团体和官僚机构——从联邦的文职机关到华尔街，从各派教会到各大学，因而其行动能力也是有限的。相反，毛泽东的新政府决心改变社会制度和官僚制度。他打算把中国的每一个机构都熔化——甚至包括那些迄今被认为并非政治性的机构，将它们在社会主义的模子中重新铸造。

为了使中国向前进，毛泽东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24位部长中有11位是非共产党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幕中，接纳了24个政党。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害怕。

除非他们认真读过毛泽东的新作——毛泽东把国家的恢复阶段称作“新民主主义”，在这一非常时期内，允许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并存，但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发展阶段，并非固定的社会模式；他从不隐讳，接下去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

过渡到社会主义应有其方法，要达到一个阶级的目标。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制定了这个方法——这篇文章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就职前的演说。在提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版本中，他没有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词，而是用的“人民”。这并不是玩弄花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范围要广阔。中共的敌人中有大量的非中国的东西，因此，许多中国人支持共产党人。只要一提“帝国主义”，“人民”就会做出反响。

另一方面，毛泽东没有照抄马克思的话而使用“专政”这个词。他将“专政”解释为改造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温和

地宣称：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在变革时期，一切都要靠属于“人民”的那些人。

就阶级目标而言，毛泽东也是相当坦率的。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升起的那面旗子，是红地上有五颗黄星，其中一颗星比另外四颗大。在天安门上空闪烁的五颗星代表着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共存的五个阶层。但大星星是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打点行装，第一次出洋。他到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一面倒”。他觉得有必要在共产党政权的源头露一露面——在随后的年代中，他的所有上层同事们都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在56岁时是五亿五千万亚洲人的马克思主义的首领，和斯大林一起开拓未来；他在70岁时，则成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景仰的人。

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非中国的世界。他毫不欣赏地观看着波尔索伊芭蕾舞团的表演。他努力品尝品种丰盛的鱼块和肉块，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些东西似乎没煮熟。

毛泽东碰上了斯大林的居傲态度，斯大林仍然没有领会到中共胜利的重要意义。“又是一个铁托。”这是一位苏联领导人在1949年时责备毛泽东的话。“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另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咒骂。在受到压力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生了病，这并非俄罗斯甜菜浓汤和伏特加造成的，这似乎是心情焦灼的证明。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与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观点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教室中占

有一席之地的一个新学生，与波兰、匈牙利及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他期望中国会象东欧一样，为社会主义的发祥地增光添彩，并向它提供产品。

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是自成一格的。他觉得他打响了将在非欧洲国家回响数十年的一炮。他对中国的自豪感要与一个并非中国造就的综合体的需要一致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斯大林好几次让毛泽东象通信员似的等候召见。一连好几天，斯大林没有同毛泽东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毛泽东感到被孤立了，一度曾威胁要打点行装回国。

毛泽东仅仅从他的主人那里要到了3亿美元的贷款（五年偿清）。这笔贷款将用中国的商品和原料偿付，并有百分之一的利息。这笔援助比莫斯科给波兰（中国比它大29倍）的贷款还要少，约相当于40年代末期苏联军队从满洲<sup>①</sup>搞回国的设备价值的三分之一。

斯大林在他的贷款上讨价还价。毛泽东同意了三件令人不快的事。俄国在1952年以前——事实证明，一直延续到1955年——继续控制满洲的某些地区：它的两个海口，大连和旅顺港，以及东北的铁路。开发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矿产的合股公司成立。当时被认为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为一主权国家。

毛泽东显得心烦意乱，他实际上的确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根据印度政府的消息来源，接受一笔不足他原来期望十分之一的贷款，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① 我国东北地区。——译注

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遇到了那些认为与斯大林打交道应更顽强些的中国人的批评。《为什么要一边倒？》，这是一本私下传阅的小册子的标题。在北京，有些人提出了策略的口号：“没有国际援助也能胜利”，公开抵制与斯大林结盟。

毛泽东是个比斯大林更敏感的人。但在世界事务中，斯大林比毛泽东更有经验。在外国的赛马场上角逐，毛泽东还欠熟练。后来当角逐在古书堆和紫禁城的红柱与枝叶扶疏的树林间进行时，毛泽东就熟练多了——那一次的对手是赫鲁晓夫。

毛泽东所得到的友好互助条约十几年后被他亲手粉碎了。北京的某些人——不是中共的高层同事，而是知识分子——不久就私下说：“我早就说过嘛。”

斯大林压倒了毛泽东。在随后的30年中——亦即友好条约规定的有效期——莫斯科之行在毛泽东的成就中并不是闪光的一页。

自从长征以来，毛泽东就没有接受过任何莫斯科的指令。从1942年到1943年的整风运动以来，他的社会主义在精神上已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

苏维埃中国不会受莫斯科控制吗？——30年代斯诺曾问过毛泽东。毛泽东答道：要是出现那种局面的话，那么“把铁路修到火星上去也有可能了”。

然而在1949年到1950年间，毛泽东觉得，除了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一膝之外，别无选择。他失去了美国，但他需要北部的安全和抗击日本人的保证，在别处得不到的这笔3亿美元对他很有用。

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感到敬畏。

他意识到他对斯大林的算计多于斯大林对他的算计，但这并没有使他转而反对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有足够的原因使毛泽东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对蒋介石不屑一顾之后很久，莫斯科仍然与他勾得很紧。1948年，斯大林至少对中共内那些愿意与蒋介石做交易的人有过间接的帮助。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斯大林是一位比杜鲁门<sup>①</sup>和艾德礼<sup>②</sup>更好的朋友（怀疑终究比敌意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24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她。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个承认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他倒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赢得了大陆的人。

斯大林在满洲的行动有时看起来并没有和中共过不去，但这些行动的基础是令人惊诧地低估了中共掌握未来的能力。当斯大林对沈阳的工厂进行洗劫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将在几年内控制这个城市。

在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过后不久，斯大林对凤梨有了好感。“给中国人去封信，”他命令马林科夫，“我要他们给我们一片地区建立一座凤梨罐头厂。”赫鲁晓夫委婉地警告斯大林，中共不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外国工厂。“这肯定会冒犯毛泽东的。”这位后来成了专搞这一套的人说道。

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的这个主意，但他的电报语调温和：“要是你对罐头凤梨有兴趣，那就给我们一笔贷款，我们自己建一座罐头厂。然后，我们用这家工厂的产品偿还你的贷款。”斯大林破口大骂，说是中国的凤梨不配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毛泽东把许多人都不放在眼里，但从没有小看斯大林。

① 1945年至1952年间的美国总统。——译注

② 1945年至1951年间的英国首相。——译注

毛泽东令人惊异地对莫斯科始终抱着恭敬的态度，以致在1950年他语调缓和地宣称自己是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是一种避免在斯大林身上投上阴影的策略。1951年，《毛泽东选集》出版前，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名显赫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该书。

毛泽东60岁时，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毛泽东称这位俄国的专制君主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另一方面，他并没有飞到莫斯科去参加葬礼。他是苏联集团中唯一没有参加葬礼的共产党领袖。

两方面的反应都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一方面赞扬了斯大林，另一方面， he 觉得只有他能够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的下一个斯大林。毛泽东没有参加葬礼，以此把他的地位抬到了现存的苏联集团的其他领袖之上。

几年后，毛泽东拒绝公开批判斯大林，甚至在斯大林被自己的同事剥夺了头上圣光之后，他也没有这样做。

毛泽东的第一批国家大法是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这两部法对旧中国是有力的一击。这两部法似乎给予迄今毫无差别的中国大众以个性。

毛泽东试图给中国农民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块土地。

但是，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具有个性的人，并非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头脑中有一个新颖的大计划，为了这项计划，中国的大众将再次成为摆设，就象他们以前在封建主义的大计划中所处的位置一样。毛泽东不打算把中国改变为一个杰弗逊主张的那种小耕种者的国度。

消灭地主，给农民分田分地，是第一步。让中国农民挣

脱枷锁是前进了一大步，几乎象改变一次宗教信仰。

然而，这是一场风暴，并非气候的改变。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并到公社里去。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搞些家长统治，因为中国太落后了，无法一下子就跃入现代社会。达到民主和平等——这些是毛泽东所信奉的价值——的确是一件复杂的事。

婚姻法和土地法无法在一夜之间就把旧中国的顽固的等级差别埋葬。

我们在30年后所看到的中国，在50年代就已具备雏形了。舞台的支柱是前后对称的。前台是一些与各种地位和身份相适应的脆弱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后台则是党——它无所不在。

对群众来说，开会成了新生活的标志。一些被开会弄得精疲力竭的人诙谐地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引用了一段话。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引述了1927年一个土豪劣绅抱怨新农会的话：“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员。”<sup>①</sup>

每家书店都有一个贴着“哲学”标签的柜台。柜台里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后，哲学还会有什么其他含义呢？提问结束了，答案就放在书架上。

迟至1948年，在四川的某些地区，人们还从没听说过毛泽东。蒋介石是大人物。毛泽东尽管对中国北部控制了15年，为自己的事业开了个好头，但控制范围扩展开去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33页。——译注

意识形态以下结论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的语言。中国是由“人民”统治的，和平无处不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世界上“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出版，发行了200万册，它提供了这些语言。

思想（姑且不说灵魂吧）统一起来了。

在一次庄重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sup>①</sup>他的格言也许使某些人感到震惊。必死性并不总是一个温和的话题，共产党人极少在这个问题上谈论他们的党。

毛泽东在涉及阶级统治时说道：“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sup>②</sup>说得不错，然而，专政就是尽善尽美的吗？毛泽东略而不提的无政府主义中有没有几分值得深思的东西？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独辟蹊径，对他们说：要多一些独立性，“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命令他的来访者们，要确保“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sup>③</sup>。

委员会毕竟是太多了吧？毛泽东接下去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分子会议太频繁，要减少。

青年干部们给他看了团章草案。有一条写道：“不要背后乱讲。”他劝告那些洞悉纸面规定与实际执行之间有差距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57页。——译注

② 同上，第1367页。——译注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页。——译注